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7.003

何伟:“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1979)”,《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7 期,第 27—40 页。

HE Wei, “Relational Interaction, Identity Adjustment and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Analyz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rom 1972 to 1979”, *Pacific Journal*, Vol. 27, No.7, 2019, pp.27-40.

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

——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1979)

何 伟¹

(1.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中美关系从破冰、缓和到最终实现正常化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反复。尽管当时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为什么两国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最终实现正式建交?事实上,中美仅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是不够的,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改变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探讨中美关系互动,认为正常化是外交决策中一国自我身份朝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调整的动态过程,而关系互动是身份调整的动力。以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两国开启了为实现建交的关系互动,美国自我身份开始趋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尼克松晚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反复,美国身份在自我调整中偏离了建交目标;但到了卡特后期,中美关系互动深化,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偏离建交目标走向关系正常化。探讨关系互动也有利于新时代中美澄清对彼此的认识,改变思维定式,避免误判,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关键词:进程;关系互动;身份调整;外交决策;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9)07-0027-14

中美关系从 1969 年破冰,到 1972 年缓和,再到 1979 年建交,历经了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的战略利益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但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临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一直未能实现正式建交。^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

象?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中美苏三角平衡、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决策因素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展开,却忽视了其进程和关系互动,无法很好地回答为什么两国虽然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却没有及时实现建交的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鉴于中国对实现建交的期待整体上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因此实现双边关系正常

收稿日期:2019-12-12;修订日期:2019-05-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16ZZD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伟(1988—),男,安徽舒城人,外交学院英语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语言学。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59 页。

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从而推动自我趋向或是偏离共同的建交目标。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从关系互动视角重新架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外交决策,认为此过程是美国协商自我对中国有关建交条件的认识、进而推动自我身份朝着共同建交目标动态调整的进程,而关系互动是驱动这一身份调整的动力,也能更好地回答为什么中美建交过程充满曲折反复的问题。

一、已有研究及关系互动的视角

目前,学界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视角,一是强调中美苏三角制衡的结构现实主义说,二是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解释,三是外交领域的领袖个体决策论。在梳理和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关系互动和身份调整的视角,为解释为什么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没有很快实现建交补充一种新的思路。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结构决定国家间的行为,认为中美建交是两国在中美苏三角动态结构下的战略考虑和抉择的结果。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三角关系是美国决定对华关系的中心逻辑,即如何通过平衡与中国、苏联的关系获得最大战略利益和保持优势地位。^① 赵学功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福特政府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始终使中美双边关系面临倒退的危险。^② 到了1978年春,为联华制苏,卡特决定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对华关系正常化。^③ 对中国而言,苏联因素也是中国调整与美国关系的基本战略思考。牛军认为,从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对中国造成了真实的威胁,同时看到美国与在苏联的核竞争中渐失优势的现状,这促使中国转变过去20年来敌视美国的政策,开始缓和对美关系。^④ 在叶胡达(Michael Yahuda)看来,在整个70年代,“联美制苏”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一条主线。^⑤ 因不满尼克松后期、福特时期和卡特前期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缓

和政策,中国坚持“日本模式”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而只有在卡特后来表现出积极制衡苏联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后,才开始愿意为实现两国建交作出一些妥协。^⑥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国内政治对一国对外政策影响。这类研究指出,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中,特殊的议会政治和总统竞选体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水门事件”激发的国会反对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而福特继承了尼克松的负面政治遗产,在对华决策上面临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⑦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指出,在万斯访华前夕,鉴于国会正就巴拿马运河条约进行激烈谈判,卡特搁置了原定与中方探讨的关系正常化议题,而当该条约获批后,卡特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来处理中美建交的问题。^⑧ 此外,总统大选也影响到美国对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为避免政治对手利用中美关系议题去攻击他们,尼克松和福特均选择在总统选举期间延迟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⑨ 同样,为避免总统大选引发的复杂局势使中美建交变得遥遥无期,卡特选择在继

①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 S. Opening to China, 1971 - 1974”,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3, 2005, p. 475.

② 赵学功:“简论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62-69页。

③ William C. Kirby, Robert S. Ross and Gong Li, eds., *Normalization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

④ 刘毅:“如何理解中美历史竞合: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领导文萃》,2016年第7期,第11页。

⑤ Michael B. Yahuda, “The Significance of Tripolarity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2”, in Robert S. Ross 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pp. 13-24.

⑥ See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 - 19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 同②,第67-68页。

⑧ Micha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61, No. 1, 1982, p. 182.

⑨ Arthur Miller, et al, “A Majority Party in Disarray: Policy Polarization in the 1972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3, 1976, pp. 753-778.

任选举前决定与中国正式建交。^①对中国而言,国内局势发展也影响到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宫力指出,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导致“左倾”思潮泛滥,给对美外交活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自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到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中央政府层面也缺乏推进中美关系的有效领导。^②在陶文钊看来,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决心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更是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③

外交决策理论认为,处在支配性地位的领袖具有独立做出决策的权力,因此在一国对外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美国而言,尼克松在整体外交上实行“缓和政策”,从而促进了中美关系在1972年实现解冻,而卡特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有利于中美在关键时刻实现建交。^④在朱明权看来,福特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阻碍中美和解的最主要原因。^⑤裘兆琳(Jaw-ling Joanne Chang)指出,到了卡特后期,美国政府不再要求中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这成为推动中美关系从此前的曲折发展走向正常化的关键。^⑥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解冻的60年代晚期,毛泽东、周恩来作出战略决策,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从敌视走向和解的新篇章。^⑦而自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一起考虑,将建立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从而促成了中美两国的最终建交。^⑧

除以上文献外,也有学者从话语^⑨、战略文化^⑩和心理^⑪层面来研究六七十年代的中美关系。然而,这些视角没有追踪中美关系正常化演变的过程。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美建交的外在原因,没有就其过程本身开展直接研究,没有分析关系互动和身份认同在其中的作用,也均存在单一解释的现象。^⑫为从理论层面阐释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也为突破现有分析中结构和个体二元对立局面,本文借鉴国

际政治关系理论中的关系本体论,从关系主义视角来重新架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外交决策,认为解释正常化的曲折反复虽然不能忽略结构体系和个体决策的因素,但要认识到这些因素作用的发挥只有在行为体关系互动的本体中才能实现。在外交实践中,关系互动塑造和建构身份认同,及时地影响一国外交决策。此外,关系互动也为分析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视角,即相对身份认同是在关系互动过程中加以协商、建构和确定的。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要实现从缓和到建交的过程,关键在于两国改变对彼此长期以来的负面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协商彼此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尤其是面对中国对于中美建交预期和条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提升自我对于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主权

①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 194.

② 宫力著:《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283页。

③ 陶文钊:“牢牢把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周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70页。

④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n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493.

⑤ 朱明权著:《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73—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⑥ Jaw-ling Joanne Chang,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Vol. 1986, No. 4, 1986, p. 158.

⑦ 陈永祥、陈宗海:“毛泽东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红广角》,2016年第11期,第19页。

⑧ 刘毅:“如何理解中美历史竞合: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领导文萃》,2016年第7期,第11页。

⑨ See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⑩ See Feng Huiy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⑪ Michael G. Kulma, “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 of China: A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orld Affairs*, Vol. 162, No. 2, 1999, pp. 76—88.

⑫ 比如,张清敏教授发现,结构现实主义不能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调整 and 变化给出很好的解释。参见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94—95页。

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的认识,从而推动自我身份调整,从偏离共同建交目标走向双边关系正常化。只有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主权和两国共有利益的认识,促成推动美国自我身份不断向着共有建交目标调整的动力,而诸如外部安全威胁,国内政治考虑和领导人决策等结构性因素也只有在中美关系互动的本体过程中才能得以有效地体现和发挥。

二、关系互动与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的动力

长期以来,实在主义(Substantialism)假定是多数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即物体、存在、单位等实在才是分析的“单位”或“层次”,在分析活动开展之前便已经存在。^① 主权国家的先在性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起点,即便是认为身份和利益是社会所建构的建构主义也在根本层面上认为,国家的某些属性在“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比如,生存的欲望是国家行为的驱动力。^② 意识到实在在本体论假设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的局限,一些学者开始从关系和过程的视角来探索世界政治的研究。

在《先有关系,后有国家:实体、过程与世界政治研究》一文中,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T. Jackson)指出,实在主义坚持分析单位的本体是“事物”或实体,且在互动之前便存在。关系本体论认为,关系的结构(configurations of ties),即反复出现的社会文化互动,才是社会分析的基本构成单位。^③ 在关系本体论基础上,杰克逊提出过程/关系主义理论(Processual Relationalism),认为此视角能够避免以实在本体论为假定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变化、反而将社会关系固化的缺陷,也能使研究者提出能够更好地解释全球化、相互依赖和国际领域内其他单位变化的理论。^④ 此外,过程/关系分析有望解决困扰国际关系理论中“施动者—结构”二元性难题,使过程和关系成为分析施动者、结构和两者互构的本体性场所。^⑤ 与杰克逊借鉴西方

社会学从过程的视角探索世界政治不同,国内学者秦亚青从儒家文化的背景知识出发,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重新建构了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具有高度理论原创性和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关系主义的视角首先认为,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社会世界是由相互关系的人的关系组成,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是由人的关系行构的,关系过程具有自主性。^⑥ 其次,关系性是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逻辑假设,关系及其互动为社会行为体存在和扮演自身角色提供了场所,^⑦ 即行为体的行动是基于关系,也往往依据自我与具体他者之间互动及其认知来开展行动。^⑧ 再次,关系是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权力也源自关系,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⑨ 最后,关系互动还能孕育规范,建构身份认同,培育集体情感。^⑩ 可以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兼顾了物质和理念的力量,包含实体和关系的社会本质,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理论。^⑪

关系理论也为身份从先在和固定的状态走

① Rebecca Adler-Nissen, “Conclusions: Relationalism: Why Diplomats Fi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range”, in Ole J. Sending, Vincent Pouliot and Iver B. Neumann, eds., *Diplomac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90.

②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 402.

③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s,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3, 1999, pp. 291-292.

④ 同③, p. 292。

⑤ Patrick T. Jackson, “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 A War of Words”, in Jennifer Steling-Folker, ed.,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p. 141.

⑥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6页。

⑦ Emilian Kavalski, “Relationality and I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6, No. 2, 2016, p. 552.

⑧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 41.

⑨ 同③。

⑩ 同⑥,第78-80页。

⑪ 陈定定:“合作、冲突与过程建构主义: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64页。

向动态的身份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行为体身份不是行为体自有的属性,是自我在参照与他者在关系中的位置而不断建构和生成的,而影响身份调整的动力来源于关系互动。^①除了驱动行为体自我身份调整外,关系互动也会影响国家间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变化。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集体身份定位为“把自我和他者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②可见,国家间集体身份是彼此间认知的共同部分,在两国的关系互动中得以形成。借鉴此定义,可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集体身份理解为中美两国对彼此认知重合的部分,即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在面对共有的集体身份时,一国的身份调整往往表现出身份偏离(identity divergence)和身份趋同(identity convergence)两个方向。身份趋同指,在关系互动进程中,行为主体强调与客体共享的规范和利益大于分歧,因此能提升自我对作为他者的客体身份的正面认识,推动自我身份调整朝着集体身份发展;而身份偏离则是行为主体强调与客体存在的规范分歧和利益分化,无法与他者身份产生关联,无法推进自我身份朝着集体身份发展。^③关系本位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塑造了彼此的认知,信任半径与其说是心理距离,不如说是关系距离。^④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两国集体身份是共同的建交目标。对此,美国的自我身份选择要么是偏离建交目标,要么是向这一集体身份趋同,从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而这一身份调整的动力则源自于中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

从关系的视角重构外交学理论及其实践可得出,外交不仅是国际体系结构的镜式反映,还具有自身的特征、规则和指导原则。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外交天然具备“关系网络”的属性。^⑤本文将外交在概念上界定为一系列关系互动的实践,“代表某一给定的政体,并将其展现给外在世界”。^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美关系互动主要表现为两国针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和

行动。在特定的外交情境下,中美两国通过不同形式的关系互动和试探性外交,才能不断增进对彼此核心利益和诉求的认识,进而不断调整自我身份向着共同建交目标的演进,不断地推动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为进一步分析所提出的关系互动影响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动力的理论观点,下文将从外交情境、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这三个维度来详细探讨外交领域的关系互动是如何具体影响个体身份朝着集体身份的趋同或分离的调整,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2.1 外交情境、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

在国际社会中,关系互动总是在特定的背景或语境下开展。行为体是关系环境中的行为体,行为体的关系圈相互叠加、交融,形成了关系语境。^⑦因此,理解外交行为的社会属性,不能仅仅关注行为体自身,还要分析其所处的情境。一方面,情境影响社会行为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另一方面,关系也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离开情境,便无法理解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互动,比如信任、同情、合作或敌意等互动行为。^⑧

本文认为一国的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及其互动构成外交情境,影响外交行为开展的时机和关系互动对行为体相对身份认知的建构。一

^① Bernd Bucher and Ursula Jasper, “Revisiting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Identity as Substance to Identifications in 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17, p. 397.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③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2, 2011, pp. 309–330.

^④ 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42页。

^⑤ 曹德军:“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4期,第23页。

^⑥ Vincent Pouliot and Jeremie Cornut, “Practic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Diploma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50, No. 3, 2015, p. 299.

^⑦ 韩志立:“关系网络的竞争:‘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挑战——以关系主义身份为视角”,《外交评论》,2019年第2期,第92页。

^⑧ Ian Burkitt, “Relational Agency: Relational Sociology, Agency and Inter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9, No. 3, 2016, p. 330.

国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匹配。在外交情境层面,当国内外情境不起冲突和有利于国家间关系发展时,外交行为主体越能充分地抓住良好的战略契机来提升主体对客体的正向认知,身份调整越偏向趋同,调整的动力越大。反之,当国内外情境互相冲突时,外交行为主体往往面临很大的压力和结构性束缚,此时主体自我身份会偏离集体身份,调整的阻力越大。

2.2 外交行为客体、预期及过程互动

关系社会是关系者 (relator) 作为行为个体与关系环境互为行构的。^① 而关系互动是由行为主体和客体组成,行为客体是主体关系实践的对象。外交官总是从事着不同身份之间的建构、维持和表象工作,外交也在“自我”和“他者”关系之间加以实施。^② 作为他者的客体是构成关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客体对主体行为的政策反馈上。客体如何理解主体在话语或行为中所传达的外交信号至关重要,这对跨文化语境的外交协商更是如此。^③ 因此,在特定的外交情境下,要使关系互动具有针对性和实现预期目的,外交行为主体必须了解客体的政策倾向和互动反馈,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实践中,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关键在于客体的反馈与主体的政策之间是否实现匹配。本文将外交行为客体界定为一国的外交决策者,在国内政治体系里具有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威。在外交行为客体层面,如果客体反馈与主体政策越能实现一致,越能促使主体改善对客体的认知,推动主体自我身份趋同于集体身份;反之,如果客体反馈给外交行为主体施加压力过高,或不接受主体的外交倡议,那么主体可能没有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动力,或因代价过高而中断相关外交努力,使身份调整偏离集体身份,调整动力受阻。

2.3 外交行为主体及关系互动的手段

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场域不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边界划分所构成,而是由不

同社会行为和文化实践所构成和建构。^④ 外交行为主体是指开启并维持外交沟通和活动的行为体,其主动性和政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关系互动进程的方向和结果。本文将外交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国外交行为的主要领导决策者,分析在特定的情境下,外交行为主体在关系互动实践中所采取的手段。

在外交实践中,行为主体的偏好和政策倾向并非是内在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关系互动中不断调整和变化。^⑤ 为启动、维持和转变外交关系,外交行为主体往往通过语言或话语实践来传达政治信号和个人诚意,实现对客体的有效说服。语言不仅是外交沟通的工具,还起到意义框定和身份建构的作用。除了语言之外,行为主体从事关系互动的手段还有非言语实践,主要表现为行动。在社会意义体系内,行动也是一种意义陈述,能起到框定意义和建构自我与他者相对身份的作用。在外交实践中,行为客体注重的是主体的话语和行为是否实现匹配。^⑥ 因此,当行为主体言行一致时,越能在自我针对他者的叙述中实现内部统一,更能实现对客体的有效说服,来自客体的正面反馈能推动自我身份朝集体身份的调整走向趋同;反之,如果主体的话语和行为经常出现不一致,会引发客体的不信任措施,其负面政策回应则不利于推动自我身份向集体身份的调整。

在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关系的发展塑造和身份调整都是在动态发

①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90页。

② Alisher Faizullaev,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Negotiation Journal*, Vol. 30, No. 3, 2014, p. 288.

③ Raymond Cohen, *Negotiating Across Cultures: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in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1, pp. 1-2.

④ Xavier Guillaume, “Unveil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 Identity and Alter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5 No. 3, 2007, p. 748.

⑤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⑥ Xing Lu, “From ‘Ideological Enemies’ to ‘Strategic Partners’: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 22, No. 4, 2011, p. 352.

互动,来不断改善美国对中国有关中美建交条件的认识。面对中国期待中美早日建交的积极信号,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言语和行为出现很大的一致性,推动了美国自我身份朝着共同的建交目标的调整。

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为美国政府选择对华开放的外交、启动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提供了较为一致和有利的外交情境。60年代晚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被印度支那事务所累,而苏联却打着缓和的旗号,背后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也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国会内部也开始出现缓和中美关系的声浪。为尽早结束越战困境,应对苏联的全球攻势,尼克松政府此时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可以联合中国制衡苏联,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权威,为其连任竞选加分。^① 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具有很大的—致性,为美国推动自我身份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外交情境。

此时,中国合理灵活的政策反馈也提升了美国对中国有关两国建交条件的正向认同。面对新机遇,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在回应美国对华决策时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积极推动双边关系朝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定期与美国在巴黎举行大使级会晤,周到热情地接待基辛格几次访华。中国也越来越多地接待美国政界人士,这有助于扭转他们先前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此外,中国也大力推进中美民间外交,为双边关系正常化搭建民意基础。^② 可以说,中国积极的政策反馈为推动美国改变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从而为加快美国自我身份走向共同建交目标提供了正向的推动力。

面对中国发出的积极的政策信号,尼克松政府在言语和行动上积极主动推进中美关系发展。在言语层面,为抵消中国对美国是否守信的猜忌,尼克松不断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其个人推进和实现中美建交的决心。1973年1月3日,在让基辛格转交周恩来的信中,尼克松再次强调美国“将在第二任期内向着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目标大力迈进。”^③ 1973年3月16日,尼克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表示自己会“尽力”在第二任期内为实现此目标而努力。^④ 同时,为践行话语承诺,美国政府也在行为层面努力改善两国的联络沟通渠道,集中表现在推动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建设联络处。美国也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比如,美国废除了长达22年的访华限制,放松对华的出口管控。^⑤ 可看出,在尼克松早期中美关系互动中,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言语和行为实践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进一步改变和推升了自我对于中国有关建交条件的认识,其自我身份不断走向中方所预期的建交目标。

3.2 1973—1977年:中美关系互动的反复与美国身份偏离建交目标

到1973年底,中美关系互动在1973年初的积极发展势头开始发生变化,并一直持续到尼克松总统下台,两国关系互动出现倒退。在福特时期,中美建交没出现根本性进展,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相对友好,甚至出现“紧张”局面。到了卡特早期,正常化议题直接被卡特和万斯放在次要位置,双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而这一切都与中美在正常化进程中关系互动本身有关,主要表现在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中方领导人的政策反馈以及美国的外交言行无法提升美国认同中国主权身份和建交三原则,也无法推动其自我身份朝着共同建交目标而调整。

(1) 尼克松后期中美关系互动变冷

到1973年底,中美关系互动与此前相比明显变缓,美国缺少推动自我身份朝关系正常化的集体身份调整的动力。在对华外交决策上,

^① Scott Kaufman, ed., *A Companion to Gerald R. Ford and Jimmy Carter*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American History), 1st Edition,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2015, p. 8.

^② 宫力著:《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7页。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73—1976*, Vol. XVIII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Doc. 1, p. 8.

^④ 同^③, 2007, Doc. 22, p. 229.

^⑤ 同^③, 2007, Doc. 17, p. 207.

尼克松所处的外交情境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虽然此时苏强美弱的局面依旧为中美合作提供有利的战略契机,但“水门事件”阻碍了尼克松对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同时,中方的反馈与美方所期待的也呈现出的一致。自尼克松成功访华后,中方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准备推进关系正常化”。^① 面对之后美国国内政局的发展,中方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依旧抱着一种冷静的态度从长远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发展。身处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方克制、稍带不满的回应,尼克松对华外交的实践也开始出现言行的一致。

基辛格和尼克松继续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出现模糊,立场也开始动摇。在第六次访华时,虽然基辛格口头上重复着尼克松政府将致力于在1976年年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但同时也在言辞中也不断表示,由于美国确实“存在困难”,不能因此很快与中国建交,而是希望寻找“某种”方式与中国建交。^② 在从台湾地区撤军方面,美国也出现了言行的一致。第五次访华时,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向中方提供一份详细的撤军计划。^③ 然而,在第六次访华时,基辛格指出,由于技术原因,第二个幻影飞行中队的撤离要推迟到1975年5月。^④ 此外,从1973年到1974年,虽然尼克松口头坚持承诺要实现中美建交,但同时却不愿意断绝与台湾地区尚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1974年5月24日,在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指出,由于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倒退,双边关系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冷淡”。^⑤ 这表明,身处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方谨慎克制的预期和政策反馈,美国在对华外交上并没有开展言行一致的实践,也无法从根本上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反而造成了双边关系逐渐变冷。

(2) 福特时期中美关系互动的维系

福特时期,中美关系互动在正常化进程中处于调整和协商的阶段,无法为美国自我身份趋向共同建交目标提供有效的动力。在外交情境方面,福特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存在不

一致。福特时期,苏联军事实力日益赶超美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日益严峻。因此,对福特而言,推动其前任尼克松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制衡苏联全球扩张的有效战略抉择。但是,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却阻碍了福特的外交行动空间。^⑥

在福特执政期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先是经历了先期段的期待,后来逐渐变得现实和淡然的过程。鉴于中国在福特执政时期依旧视苏联为头号劲敌,中国对政府对新上任的福特总统的希望是,他能改变尼克松后期对华政策的倦怠,尽快按照“日本模式”来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中国所处周边安全环境较为有利,对外关系也出现可喜的局面,更是拒绝在建交的根本性原则上作出重大的让步。由于福特政府一直不切断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这让中国政府逐渐怀疑美国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诚意,也在不同的场合给出相应的批评。面对中国方面的不满,如何在抚慰中国领导人情绪进而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不给苏联留下美国战略守势的印象,成为福特和基辛格时期对华外交的主要目标,这也影响到福特对华的言语和行动实践。

在言语层面,福特和基辛格均使用话语积极建构两国在关系正常化议题上的友好合作,突显美国的外交努力,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美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诚意。^⑦ 然而,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行动与言辞出现了很多的不一致,这不仅表明美国无法认同中国之于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也令中国领导人正式怀

^① Priscilla Roberts ed., *Windows o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 1973-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8-179.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73-1976, Vol. XVIII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Doc. 58, p. 388.

^③ 同②, 2007, Doc.18, p. 220.

^④ 同②, 2007, Doc. 75, pp. 470-471.

^⑤ 同②, 2007, Doc. 80, pp. 500-502.

^⑥ Jaw-ling Joanne Chang,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Vol. 1986, No. 4, 1986, p. 126.

^⑦ 同①, pp. 529-530.

疑美国推进对华外交的真实意图。首先,尽管美国屡次口头表示要通过加强中美合作来对抗苏联,但其对苏的整体政策依旧趋向缓和,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其次,虽然美国承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但却始终保持与台湾地区来往,更是在公开场合重申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台湾地区的安全。^①最后,在福特执政后期,美国在处理双边文化和人员交流上的言语和行动也出现了许多的不一致,无法为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提供动力。

然而,美国无法忽视中国在全球战略均衡中的作用。在其执政后期,为了打造联华制苏的印象,福特在基辛格的策划下开展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对华外交实践,来构建中美关系改善的表象,如福特访华,继续从台湾地区撤军,实施单方面的对华军事政策等。^②但是,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些外交行动最多只是暂时性的步骤,旨在拖延解决台湾问题。不可否认,通过这些象征性的外交实践,美国政府成功地维持了中美关系良好互动的表象。但在基辛格看来,中美关系在现实上开始出现其首次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紧张”。^③

(3) 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的倒退

到卡特执政初期,美国自我身份在走向两国共同建交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倒退,身份调整走向偏离。此时,卡特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出现了不一致,无法为卡特开展对华外交提供有利的外交情境。在整个70年代,苏联加紧与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争夺,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这本有利于美国推进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然而美国国内政治却不利于卡特政府实施言行一致的对华外交实践。一方面,在对华关系上,卡特政府初期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白宫官员在对华态度上出现明显的分化。另一方面,考虑到国会正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卡特不想因为推动中美建交而影响到一些亲台议员对此条约的投票立场。^④

与此同时,中方对卡特政府的政策回应也经历从最初的期盼到后期日益强硬的变化,也

无法反向给美国提供正面的政策反馈,来提升自我对中国核心利益和诉求的认同。中国希望这位新上任的和无中期选举压力的总统能意识到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远见卓识。然而,卡特和万斯不在乎中国的利益和反对,反而积极与苏联开展有关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此外,中国接受中美建交的前提一直没有改变,即“日本模式”。因此,面对卡特对对华议题的忽视,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日渐强硬。比如,在回应万斯访华前所发表的演讲中,外交部长黄华指出,中美两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⑤

身处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国日益坚定的态度和立场,卡特对华外交中的言语和行为无法实现内部一致,这尤其表现在万斯访华的试探性外交上。为营造访华前的舆论氛围,万斯1977年6月29日在亚洲协会的演讲向中国政府保证,卡特政府不会偏离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对《上海公报》根本原则的理解,并致力于实现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⑥然而,在万斯访华前夕,卡特指示他与中方会谈时摊开美国的“最大限度”立场,这意味着美国实现对华建交的前提是,中国政府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同意美国政府官员在建交后继续留在台湾地区,并

① Gerald Ford,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May 6, 197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65>, 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1日。

②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1–90.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73–1976, Vol. XVIII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Doc. 132, p. 838.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 201.

⑤ 转引自 Steven I. Levine, “China Policy During Carter’s Year One”, *Asian Survey*, Vol. 18, No. 5, 1978, p. 440.

⑥ Breck Walker, “Friends, But Not Allies—Cyrus Vanc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4, 2009, p. 587.

在非官方组织里代表美国的利益。^①在与中方会谈中,万斯表示,“总统本人打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能找到一种既有利于中国人民独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又能确保美国继续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层面的交往。”^②这表明,美国政府并不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反而在外交言行上强化了这种反向认知。邓小平对此评价说,“日本模式”是中国可接受的唯一方式,是否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地区乃属中国内政,这不容美国干涉,此外美国政府人员通过非官方组织驻留台湾地区是双边关系的“倒退”。^③此时,美国在协商对中国主权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偏离了中国所预期的建交目标,也因此无法因着自我身份调整而推动双边关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化”。

3.3 1978—1979年:中美关系互动深化与美国身份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

到了卡特执政后期,中美关系互动一改之前反复和曲折的状态,开始走向频繁和深化。而美国也在此阶段两国深入的互动中快速提升了自我对中国主权身份和建交三原则的认识,从而推动自我身份快速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对华外交决策上,卡特后期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中国此刻也给出了积极的信号反馈,这均有利于卡特开展言行一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自我身份趋向于中国所预期的关系正常化。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一致性。自1977年秋到1978年底,苏联在大打与西方缓和旗号的同时,加紧强化军队实力,不仅给美国的北约盟友,还给美国本土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④万斯访问莫斯科一无所获,美苏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失败告知,均促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虑中国的重要性,联合中国制衡苏联成为必要的战略决策。在国内层面,此时卡特积累了一定的国内政治资本,也有了更广的空间来实施其基于人道主义的全球外交,这尤其体现在巴拿马运河条约

获批和戴维营协议达成等对外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⑤

在美国因着内政外交之需而考虑主动提升对中国利益认同的同时,中国发出的积极信号和政策反馈也从反向推动了美国加强与中国关系互动,进而推动自我身份朝着共同的建交目标不断迈进。与此同时,中国北部边境继续有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南部边境也面临越南等不稳定因素。此外,为了满足加快发展国内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求,中国领导人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早日正常化,也因此在不同场合向美国发出积极的外交信号,期待与美国在《上海公报》的原则下为正式建交开展谈判。1977年11月,黄镇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目的是为了正式推动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8月,柴泽民向布热津斯基传达了中国政府的想法,建议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美越早完成关系正常化越好。中国的言行所释放的信号表明,中方已经做好准备同美国开展正式的建交谈判。

身处有利的外交情境和面对中国积极的政策反馈,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实践中的言语和行为开始出现一致,这既有针对中国和苏联的言语建构,也包括对华的正式建交谈判。在言语层面,为拉近中美之间的关系,卡特首先通过直接的话语实践来建构个人对中国重视,表达对《上海公报》原则的尊重,以及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1978年1月19日,卡特向国会发表国情年度咨文,表示要“在《上海公报》的框架内,继续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Doc. 43, p. 135.

^② 同①, p. 170.

^③ 同①, Doc. 50, p. 201.

^④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oper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 856-857.

^⑤ Xing Lu, “From ‘Ideological Enemies’ to ‘Strategic Partners’: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 22, No. 4, 2011, p. 338.

现关系正常化”。^①此外,鉴于“苏联”是这一阶段中美两国共同的“他者”,卡特也通过此议题来间接地对双边关系进行积极的话语建构。卡特在不同的话语场合将“苏联”建构成“威胁”,带有“恶意倾向”,间接暗示中美两国联合制衡苏联,推动中美合作,早日实现两国建交。^②

为尽快兑现口头传递的积极信号,卡特也大力开展实质性的对华外交,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这集中体现在中美建交谈判上,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加以开展。第一条沟通渠道是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代表的直接秘密谈判,采用的是逐步试探的谈判策略。目的是首先建立一些成功的谈判记录,为后期艰难议题的谈判奠定基础并营造氛围。^③为此,双方根据重要性将议题进行排序,先从不敏感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议题入手,再逐渐过渡到涉及台湾地区在内的较为困难的议题。^④从9月到12月,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伍德科克在10月底亮出美国的底线,把最终能否实现建交的压力推给中国。鉴于当时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和国内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考虑如何评估卡特政府在结束与台湾地区防务关系时所面临的国内困难,以及是否接受美方的立场,而此时卡特政府在对华建交谈判中开设的第二和第三条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条沟通渠道是在布热津斯基与柴泽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采用的策略是通过保持与中国就国际形势以及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双边关系议题保持沟通,一方面表达美国与中国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向中国施加压力。当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关键的1978年秋季,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此时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却进展顺利。布热津斯基抓住中国的外患,不断向中方更新美苏缓和的最新发展,迫使中国明白,如果在苏美关系改善之前不抓住机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建交条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将继续受挫。此外,为在最后时刻推动建交谈判进程,布热津斯基在伍德科克与邓小平举行会谈的前一天会见柴泽

民。他表示,为补偿中方接受美国有关中美建交条件时遭受的战略损失,美国将在建交后邀请华国锋或邓小平访问美国;同时布热津斯基也以“朋友”的身份委婉地指出,鉴于美苏最新一轮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即将完成,他希望中美关系尽快正常化,这样邓小平能赶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问美国。^⑤

第三条沟通渠道是在霍尔布鲁克与韩叙之间开展的,主要沟通的是中美建交谈判中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卡特意识到,对台军售将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艰辛和困难的问题。为防止其政府重蹈福特对台政策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进展的覆辙,卡特在台湾议题上开辟了一条与中国直接讨论的渠道。美国一方面极力向中国表明,其国内复杂的政治情况和历史遗产使美国不能完全废除对台湾地区的安全承诺,期待中国理解美国的难处;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对美继续对台军售的异议局限在此渠道,不至于影响双方在北京的正式谈判。^⑥

卡特政府有效利用了这三条谈判的渠道,加强了与中方的关系互动,在细致耐心地表明美方立场和尽量争取中方理解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我对于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的认识。12月4日,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告诉伍德科克,虽然中国对美国提出的建交条件表示异议,但赞同美国作出的将1979年1月1日作为两国正式建交日期的

① Jimmy Carter,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January 19, 1978,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state-the-union-annual-message-the-congress-2>, 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5日。

②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 - 1980*, Washington, D. C.: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3, Doc. 193, p. 478.

③ Micha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61, No. 1, 1982, pp. 185-186.

④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Friend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2, p. 79.

⑤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 p. 261.

⑥ James C. H. Shen, *The U.S. and Free China: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 D. C.: Acropolis Books, 1983, p. 218.

提议。12月13日,邓小平亲自就中美建交公报草案同伍德科克举行谈判,并接受了卡特发出的访美邀请。在12月14日下午谈判中,虽然邓小平坚决抗议美国继续对台湾地区军售的立场,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伍德科克提出的搁置分歧的作法,将美台军售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后再解决。至此,中美完成了最艰难的建交谈判,两国领导人于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5日同时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这内化了中美正常化的关系,促使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先前偏离状态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带动两国相对身份关系实现了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转变。

案例分析表明,中美自关系缓和后并没有很快建交是因为美国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也是两国在动态反复的关系互动中协商彼此利益和身份认同之需。关系互动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典型特征,既提供了美国在对华外交决策中自我身份朝着两国共同建交目标调整的动力,也解释了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后期、福特和卡特时期所经历的曲折反复。自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以来,在中国对中美建交的迫切期待下,在中美双边关系互动的进程中,美国自我身份开始向两国共同建交的目标调整。然而,自“水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互动变冷,美国自我身份在朝共同建交目标的调整过程中走向分离。福特政府仅是维系了中美关系互动和彼此的身份关系,但两国关系在实际层面出现了倒退。在卡特早期,卡特和万斯忽视了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倒退,美国自我身份调整走向偏离。但到了后来,卡特终于意识到中美建交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在布热津斯基的推动下,开始加速推动中美关系互动,促使美国自我身份趋向于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最终实现了中美正式建交。

四、结 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重实体、轻关系的偏好导致外交学理论研究被边缘化,也无法很好地捕捉和解释以关系互动为基本特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实践。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关注存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的重要性,认为关系具有本体性,过程和关系在实体功用发挥之先,是行为体和结构互动的中间场所。在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以关系互动来重新建构外交决策的过程分析,认为在外交实践中,关系互动塑造和建构身份认同和调整,影响一国对外决策。具体来说,在特定外交情境下,主客体间关系互动决定了相对身份调整及其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这一视角融合了结构性和个体性解释因素,说明了自中美关系缓和以来正常化曲折反复的动态进程,相关身份的协商和调整。这在加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与外交学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响应了开展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实证研究的呼吁。^①

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关系互动和身份认知的重要性对于当今中美关系的发展依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不仅对中美两国十分重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国际秩序的有序、均衡和稳定。这更需要两国积极保持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使之成为双方深入战略沟通,积累重要共识,探索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的有效方式。此外,面对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上的不同,美国在新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身份、彼此的利益诉求以及两国合作共赢的空间和前景,对于美国摆脱零和博弈思维,走出疑虑和矛盾,在既有的重要共识基础上实现中美关系健

^① 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36页。

康稳定发展十分重要。为此,中国需要在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互动同时,及时把握美国如何看待和发展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因利导势,讲述好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理念,讲述好中国的

思维和行为方式,主动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美国认知,避免误判,妥善处理分歧,使双边关系互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编辑 贡 杨

Relational Interaction, Identity Adjustment and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Analyz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rom 1972 to 1979

HE Wei¹

(1.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It takes some ten years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from initiation to rapprochement. Though faced with common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shared strategic interests, why does it take such a long time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inally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fact, merely the common interests shared by China and the US are not enough.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to change the negative recognition towards each other, and such a change could only be made in relational interaction at the diplomatic level.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hina-US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ng that normaliz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ountry adjusts its self-identity towards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featured with the shared goal fo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le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provid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ince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on the way of bilateral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towards normalization, whereby the US self-identity started to evolve towards the shared goal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late Nixon's presidency, the whole Ford's presidency and Carter's early presidency, the bilateral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went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 overall US self-identity adjustment gradually diverged from the shared goal. However, in the later period of Carter's presidency, the bilateral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deepened, and the US self-identity evolved quickly from divergence towards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is conducive to China and the US to ha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 change their mindset, avoid misjudgment, and provide the positive driving force for bilateral 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rocess; relational interaction; identity adjustment;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